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历史诠释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作为学校性格和气质的集中体现，这一校训昭示了以身作则、教书育人的教师教育的理想境界，树立了新时期中国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展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历史传统和发展前景。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引人注目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贴切。它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征，又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用于百年师大的身上，没有比这八个字更恰当的了。因此，这一校训在 1996 年夏一经提出，不仅立即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同，而且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共鸣。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上，在座谈、会议、讲话乃至日常的用语等各种场合下，引用这一校训，称赞这一校训。

这一校训之所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这简短的八个字，是中国 2500 年优秀教育传统的厚积薄发，也可以看作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教师的郑重誓言。

一

按照提出这一校训的启功教授的阐释，所谓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是“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这一解释，突出了“学”与“行”的意义，表明了一个北师大人在学问和行为两方面所应达到的境界：“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学养和学识，“学为人师”就是要使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技能，在学问上足以为人之师，有能力向他人传授知识，指示门径，启导来学；有能力为人释难解惑，将其引领进入豁然澄明的境界。“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德性和品行，“行为世范”就是要在道德情操、道德信念、道德行为方面，以身作则，以己示范，成为他人生活的引路人，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学与行，是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灵魂，也恰恰是对学与行的强调和追求，构成了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成为传统师德的核心内容。

中国教师的这一优良传统是由孔子开创的。抱持“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的信念，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为中国悠远而富有成效的教育事业夯实了一个坚实的起点。他坚执有教无类的原则，向所有的学生敞开了进校学习

的大门，不分贵贱，无论贫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提炼总结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和学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是教师的典范。于学，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一部《易》，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惰和自满，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好学乐学的人。沉醉于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习是他生命历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快乐的事情。他不以“生而知之”和“多学而识之者”自居，本着学无常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不耻下问，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扩充自己的知识，增益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境界。

孔子以文、行、忠、信施教，但学“文”被他看作是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之外“行有余力”的事情。在强调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应该服从于道德教育的需要的前提下，孔子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忧，认为道德应该成于内，但更应该行于外。行是那样重要，是考察和评价一个人最主要的标准，因而他强调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懂得教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教育力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铸造器皿的模子或范式出了问题，就只能制造畸形和怪物。师范的意义，就是要教师以自己为模范，做学生的表率。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不仅以其好学的精神和精湛的学识，获得了学生的敬佩和爱戴，也以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风范，赢得了“万世师表”的尊称，铸就了“至圣先师”的牌位。支撑这面牌位的，正是学和行这两根支柱，“万世师表”也在孔子的学行实践中得到落实而不空疏。

孔子开创的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经过全社会的精心呵护，尤其是广大教师的辛勤培植，由一脉幽深秀丽的清溪，成长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不仅政府官员、历代学者、学生家长乃至教师自己，都强调学和行对于教师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多重职能，既要为人师，也要做经师，教书与育人的双重使命不可或缺。没有好的品行不行，有好的品行而没有一定的学养也不行。对于教师的要求，古人在强调“行谊谨厚”时，也强调“文义通晓”；在突出“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同时，也指出“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的绝对必要；在强调必须“以

身率人，正心术，修孝弟，重廉耻，崇礼节，整威仪，以立教人之本”的同时，也强调“守教法，正学业，分句读，明训解，考功课，以尽教人之事”。诸多“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并美”的说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士人尤其是教师学和行的一贯强调，形成了代代相传的传统，结晶出众多形式整齐、简洁明快的句式，如“学为人师”、“经为人师”以及“行为世范”、“行为世表”、“行为士则”乃至“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表”、“经为人师，行为世范”、“经为人师，行为仪表”等等。这些语句立足、来源于传统，又进一步培植、提炼了传统，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直接渊源。

说到这些形式整齐、文字简洁的语句，一般都举列《世说新语》中的那段话：“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句话所标举的言和行，实际上可以归并到行的范畴。陈仲举即陈蕃虽然是东汉末年桓帝时人，但这段话出自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无论是就时间的早晚、内容的全面，还是句式的典型而言，在《世说新语》的这段话之前都另有先例。

早在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在向光武帝推荐伏湛的上疏中，就曾说伏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东汉和帝之初，窦宪也上疏称屯骑校尉桓郁，“结发受学，白首不倦，经为人师，行为儒宗。”这两则材料，比刘义庆的说法早约400年，而且赅括了学和行两翼。在当时把儒家经典当作学习的核心内容的情势下，“经为人师”之说，典型地体现了汉代拘于较为单一的儒家经典的学术氛围。

汉朝末年的陈寔，在一篇碑文中称颂主人“文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时期的邓艾，12岁得读陈寔的碑文后，为其标树的境界和表述的精到所折服，“遂自名范，字士则。”“文为世范”有别于“经为人师”，反映的是文人与学者的区别，是文苑与儒林的不同。与邓艾同时的刘靖，在《请选立博士疏》中，建议“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以改变太学设立20年来少有成效的状况。

《世说新语》之后，类似的说法在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庾信在《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中，称颂陆逞“仪表外明，风神内照，器量深沉，阶基不测。

事君惟忠，事亲惟孝。言为世范，行为士则。”隋朝卢昌衡，在任徐州总管长史时，以能干著名。“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德为人表，行为士则。”当时以为美谈。

《旧唐书》的作者，赞颂唐文宗“文章可以为世范，德行可以为人师”。

到了宋代，相关的说法更是繁盛。楼钥有“望重吏师，行为世则”之语，苏轼有“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之论，周紫芝有“学为人师，才本王佐”之言，沈遘有“学为世师，行为人表”之说。在陆游的《渭南文集》中，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说法。如在《谢解启》中说：“恭惟某官，行为世表，经为人师。早学长安，识子云之奇字；晚游吴会，得中郎之异书。”在《杨夫人墓志铭》中则有：“山堂巩先生讳庭芝，经为人师，行为世范。德义之化，自家人始。”

已往这种说法的指代对象，大都针对的是行政官员，从宋代开始，转移到了学者尤其是教师身上。余靖在国子博士毛应佺的墓铭中，称颂墓主“行为士则，才为世贤”。司马光在《祭郭侍读文》中，称郭侍读“文为国华，行为士则”。国子监直讲孙复被贬之后，赵概等人上疏，称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结果孙复得以官复原职。吕溱代拟的《殿中丞致仕同详议大乐胡瑗授光禄寺丞充国子监直讲制》称：“汝瑗行为物矩，经为人师，以处士拜官，不屑从政。致仕在里，无忘讲学。”

正是在宋朝，出现了“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这样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最为接近的说法。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宋高宗赵构。宋高宗在视察太学的时候，有感当即而作文宣王赞。后来又利用闲暇，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亦为制赞”。其中关于颜无繇的赞词是这样的：“人谁无子，尔嗣标奇。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请车诚非，顾匪其师。千载之下，足以示慈。”这八个字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完全相同，差别仅仅是两句话前后互乙。

宋代之后，相同的说法依然很多。如在金朝，赵秉文称颂崔宪：“淹贯六籍，兼综群艺，循循焉，彬彬焉，善诱善导，可谓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表，慈祥孝友，笃密恺悌，人无得而称焉。”元朝的杨宏道，称邹平主簿王宏道：“学为人师，行作世范，词赋造乎二李，济南谓之三王。”明清时期，针对当时“举业师”的盛行，教师的德性被强调到了极至，乃至破坏了学与行的平衡，这样简洁整齐的句式不再常见。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校训，简洁明快，贴切允当，言近而旨远，辞约而意丰。它凝炼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着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熔铸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追求，对今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

向的意义。正因为植根于传统的沃土，它才得以根深叶茂，弥久常青；正因为有2500年丰富养料的滋养，它才得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归结到一点，我国教师教育悠远而丰厚的传统，是润泽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丰沛泉源。

（作者徐梓，原载《教育学报》（2006年12月），原文有删减。）